

关注·
红色记忆

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延安的原野

——我的杨家岭采访本

高建群



今年是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八十周年，陕西省文联副主席、省作协副主席高建群撰写了题为《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——我的杨家岭采访本》的万字长文，文章饱含深情地记述了当年周扬、丁玲、贺敬之、陈荒煤、冯牧、草明、郭小川、田间等六十余位老艺术家回延安时，作者陪同和采访的方方面面，可谓发春雷第一声。

田间是1982年4月底回延安的。那是一个暮春的日子，万花山上开满了牡丹花，瘦瘦矮矮的诗人，一步三喘，踏歌而行，缓步向花丛中走去。

田间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。延安的街头诗就始于田间。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，/敌人，用刺刀，杀死了我们，/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，/看，这是奴隶！”这是田间的街头诗。街头诗的始作俑者，当然还有陕北籍诗人高敏夫——陕北无产阶级文学的开拓者之一，他大约是受了苏联文学浪漫气氛的感染，一度曾易名高尔敏夫。田间这个当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翩翩少年，如今已进入生命的暮年。坐在延安宾馆里，他用深沉苍老的声音，向慕名而来的青年讲述着往事。人们一走，他便默默地靠在沙发上，半闭着眼睛，像一位鏖战归来的疲惫士兵，不，是鼓手，许多年前，闻一多先生曾这样称颂过他。

上面这一段文字，是我当时采访他时的手记，那个慕名而来的青年，说的就是我。记得田间的身材大约一米六不到，穿一身有些褪了色的蓝人民装，粗一看像是灰色，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，帽檐耷拉下来，遮住了眉头。他神情忧郁，不知为什么满腹心事。一个三人沙发，他蜷曲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，显得那样矮小、疲惫，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。他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采访提问，话语很短。谈话间，只有当提及延安时代的时候，他暗淡的眼神才猛然闪出火花，眼睛像鹰隼般闪闪发亮，但只一会儿，又暗淡下来。

田间在延安待了三天，参观了枣园、杨家岭旧址，去延安城南三十里的万花山参加了延安文学青年的一次诗会，朗诵了他即席创作的《延安万花山》，并且给当时的延安大学创作学习班的学员作了一次报告。

老诗人在报告中说：“我是1938年来延安的，我还要继续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，还要不断从延安这块土地上汲取营养，这就是我这次来延安的目的。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忘记延安，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觉得《讲话》的一些基本东西还是要肯定的，还是值得我们继续学习的。《讲话》的根本之点是‘文艺为人民服务’的问题，这在现在更应该肯定。经过‘文革’的一段曲折，《讲话》依然是光彩夺目的。正像我刚刚完成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：虽然是风尘仆仆，但是掩盖不了它的光辉；尽管它山回路转，依然是宝塔山；虽然时间推移，但旧时的牡丹还是那样璀璨。”（根据录音整理）

田间临走时对我说，他现在隐居在北京后海的一家独门小院里，要我去北京时一定要忘了去他那里一叙。他还说，终于回了趟延安，了却了他一桩心愿，他年事已高，身体又不太好，怕是最后一次回延安了。老诗人的话不幸言中，他回去后不久，我就从报纸上看到了他去世的消息。

1982年5月23日前夕，陕西组织一批新老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延安，胡采、王汶石、杜鹏程、李若冰四位老作家带队，一行百余人在延安杨家岭开了纪念大会，并去枣园、南泥湾等地与当地群众联欢。

胡采是当时陕西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人。当年毛泽东同志讲话之前，全体人员曾有一张合影。时值纪念“5·23”《讲话》，讲解员将这张照片放大，用一个木牌

立在杨家岭那间石屋前面。胡采当时是边区文协副秘书长兼《群众》周刊负责人。见到照片后，我问：“胡老，你站在哪里？”抑或是谦虚，抑或是确实记不得了，胡采说，他不记得拍照这事，拍照的这一次会议他也许没参加，说完就随参观人流进入了石屋。我不甘心，在照片前仔细端详，终于发现在一大堆人头中有一个颇像胡采，脸型像他，神态像他，细细的长脖子上是一颗小小的头。我赶紧去找胡采，胡采重新回到照片前，仔细地辨认了半天，辨认出了他左右站着的人，终于确定了那确实是当年的他。后来就有一茬一茬回延安的老同志回忆，那确实是胡采。照片上所有的人后来都被回忆起来了，名字附在照片下面。胡老当时像孩子一样笑了。站在旁边的我亦十分感动。

王汶石、李若冰延安时期曾是“西工团”的演员，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前者以《风雪之夜》、后者以《柴达木手记》驰名于当代文坛。联欢会上王汶石在大家的起哄下，将延安时期演过的一个角色（《二溜子改造》）重演了一遍，博得满堂掌声。李若冰善良而精细，他身上政治家与艺术家的风度并存，后来我长期在李老手下工作。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是《保卫延安》的作者杜鹏程了。杜老当年已患脑血管病，行动不便，但还是参加了所有活动。记得上南泥湾的一个山坡时，他差点跌倒。早年的超负荷伏案劳作和“文革”中所受的迫害，给他的身心以极大摧残，他除了行动不便外，感觉精神也有些恍惚，神志不大清醒。在延安的日子，他常常激动得难以自持，嘴唇发颤，手指发抖，在他面前，我强烈地感觉到老一辈战士兼作家的气质。

1979年陕西作协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作者座谈会上，几位老延安听说我是从延安来的，立即将我拉过来坐在他们身边，事情过去许多年了，这事我一直念念不忘。杜鹏程于1991年冬去世，病危期间曾给我来过一封短函，勉励我努力创作。

1982年5月28日至30日，陈荒煤率电影“百花奖”“金鸡奖”颁奖大会上的一行人来延安。我对陈荒煤慕名已久，奈何由于有白杨、田华、王心刚、李谷一、李秀明、龚雪等一众名流，所到之处尽被人围观，不能近前，而我又习惯于凑热闹，因此未曾谋面。

是年9月30日，葛洛、韦君宜率华北、西北地区中青年作家来延安参观学习。葛洛是河南洛阳人，那一年62岁。他1938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来延安，抗大毕业后，任鲁艺助教，在下农村体验生活期间曾先后兼任碾庄乡、桥儿沟乡副乡长，1946年随解放军离开延安。这个团队里还有铁凝女士。那时她多么年轻呀！乌黑的头发，明亮而乌黑的眸子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会场一个角落，听韦君宜讲课。我后来有一次跟她说起这事，铁凝说，这是她一贯的风格。

工作之余，葛洛重返碾庄和桥儿沟。葛洛住过的碾庄，当年的房东已经去世，他与房东的儿子畅谈回忆旧事。这个房东或许还是他解放区小说《卫生组长》中的原型吧。最使葛洛激动的是，在桥儿沟的一座山坡上，他找到了当年在鲁艺结婚时的土窑洞。他说：“找到这里好似当了第二次新郎！”葛洛的人缘极好，在碾庄、在桥儿沟，还有不少老人认得这位当年的老乡亲，故人相见，即情即景最为热闹。

“千声万声呼唤你，母亲延安就在这里！”是年11月23日至25日，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。这是诗人继1956年回延安参加“五省（区）青年造林大会”写出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回延安》之后，第二次回来。诗人是年58岁。那天，陕北高原降了一场薄雪，诗人参观了枣园、杨家岭、桥儿沟等革命纪念馆，并且登上了清凉山。登山时吟诗一首，诗云：“我心久印月，万里千回肠，劫后定痲水，一饮更清凉。”延安文学艺术界为诗人的到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。会上，一位业余作者朗诵了诗人的《回延安》，纪念馆一位讲解员唱了诗人作词、马可谱曲的《南泥湾》，唱到情深处，贺敬之掏出手绢，拭起泪来。

薄雪初晴，我和陕西记者、评论家肖肖儒，陪诗人上了一趟宝塔山，诗人穿一件旧黄布大衣，蹬一双平底鞋，居延安多年，我竟不知道宝塔可以上去，诗人说可以。于是，我在前面牵着他的手，顺着宝塔里狭窄陡峭的台阶，上到了第二层的瞭望口。本来还可以上到最高层，我怕他有闪失，拦腰抱住了他。站在这里，三山交汇、二水分流的延安城尽收眼底。诗人说宝塔南边的那条小沟里，当年有一个日本工农学校，日本轰炸延安时被炸成了废墟。说到这里，他面色严峻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后来他又说，鲁艺有一架钢琴，洗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就是在这架钢琴上弹出来的。1947年撤退时，行军途中，将钢琴拆成零件埋了起来，那架钢琴是一件珍贵文物，如果能找到它，会是一件教育后代的活教材。诗人走后，延安有关方面曾多方查找，钢琴至今仍泥牛入海，杳无下落。诗人走后，我在《延安报》发表了专访《双手揆定宝塔山》。

贺敬之大约在1985年还回过一次延安。我将自己的采访日记翻了翻，可惜平常丢三落四的，没有找到那个时期的采访本。

而与贺敬之齐名的另一位杰出诗人，才华横溢的郭小川，70年代初曾回过一次延安，有《郭小川诗选》扉页的那张照片为证。那时我正在“白房子”服役，无缘拜识，可是我的朋友、延安诗人原上草却有缘与他邂逅。原上草正在清凉山下面延河桥旁的一家小饭馆吃饭，郭小川登清凉山下，也到了这家饭馆，并且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。原上草是诗人郭小川最热烈的毫无保留的崇拜者，他可以将郭小川所有诗作倒背如流。原上草是个见面熟，不知怎么就打听到了眼前这位有些忧郁的人就是郭小川，当时惊喜的状况我可以想见。除了表达久仰的心情外，他开始背诵起郭小川的诗句。我想在那个严寒的日子里，贫病交加的诗人一定会被深深地感动并有一丝慰安——他的作品是如此深入民间。我也是郭小川热烈的崇拜者，郭小川去世十周年时，我曾在《西安晚报》上发了篇《郭小川十年祭》，随后将晚报寄给他的夫人杜蕙。

蔡其矫是1938年到延安的，在鲁艺任教，大约是1938年底又随部队下了太行山。他在延安短暂停留，就顺着当年南下的路，经延川黄河延水关渡口走了。此行他留下了一首诗《过延川》，写得漂亮极了，诗中有一句：“漂泊的灵魂，永远寻求陌生的地方。”我在座谈会见过他，记得他身体强健，穿一件运动服，像运动员一样，并不显老。

1982年10月，杨沫来延安参观访问，因为《青春之歌》，她是家喻户晓的作家，更兼她和白杨是姊妹，因此上次没见过白杨的人，这

次都来看她。杨沫参观了革命旧居，上了清凉山，所到之处，均受到十分隆重热烈的欢迎。作家和延安文学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。记得她戴着假发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戴假发。记得我采访她时，面对面相坐，膝盖抵着膝盖，突然她一个喷嚏，头一勾，假发掉了下来。而她像个没事人一样，两手一张，搂住头套，又扣回头上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
1984年3月8日，杨植霖取道庆阳，回到延安。杨曾是职务很高的地方领导，因为《王若飞在狱中》一书留下文名。我陪杨老四处参观，很是忙碌了一阵。最感人的是在兰家坪寻找他的旧居。那时大约是1942年，当时他是内蒙古的领导之一，中央调他来党校高干二部学习。他在一座荒凉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孔半是坍塌的窑洞，说上党校时就住在这里，他的隔壁住的是丁玲和叶群。叶群当时好像还没有和林彪结婚。他说，丁玲为人直爽是个女中丈夫，那年三八节，他和丁玲站在这山坡前，远远的一个背着三八大盖的人过来了，这时丁玲抓住他一个胳膊，手有些发抖。丁玲对他讲，她平日最忌讳三八这两个字，一见背三八大盖的就发怵。

杨植霖很高，大约一米八三，穿一件黑呢子大衣，毛围巾平展展地交叉裹在胸前。虽是汉族，但大约是在土默川出生的缘故，他的气质中有一种蒙古族朋友那种真诚而豪迈的东西。杨植霖回甘肃后，将他与人合著的诗集《青山儿女》寄我。

杨植霖老人此行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倡导成立中华诗词学会。他在延安联络了黑振东，在西安联络了杨海章、霍松林，在内蒙古联络了布赫，在北京联络了楚图南、周谷城。中华诗词学会于1985年端午节在北京成立。我参加了成立大会。

1984年5月7日至10日，时值《讲话》发表42周年，方纪、草明、曾克、金紫光、何洛、李琦、刘芳、路明远等一行老延安，由中国文联组织回到延安。

方纪半身不遂，坐在轮椅上，由他的儿子方大明推着。据说他在“文革”时期受到过极大迫害，冤狱长达10年之久。他的神志大约也有些不太清楚，在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，看见玻璃橱里陈列的纺车，他一下子激动得快要从轮椅上跳下来，他说这纺车是他的，是他大生产时用过的。我们怕他失手砸坏了玻璃，只得赶快离开。纪念馆墙壁上陈列着那些首长检阅时的照片，他突然一挺胸膛要站起来，向首长敬礼。大家赶忙拦住他，说这是照片，不是真人，可他还是敬了礼，于是只好由他了，他坐在轮椅上，大约是向彭德怀将军或者陈赓将军，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。不过在我采访他时，他的神志很清楚，他能记起早年那些事情的细枝末节，我问他著名散文《挥手之间》的写作经过，他说，当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，延安东关旧飞机场上，他也是欢送人群中的一员，目睹了毛主席登上飞机的情景。那时，他像所有在延安的人一样，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。后来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毛主席走下飞机时挥动帽子的那个特写镜头。那是历史的一瞬间，对着这张照片，他觉得他想要创作的这篇文章有了标题和主题。方纪的右半个身子不能动，他用左手写毛笔字，书法苍劲有力，写完字上，落款上还要写上“方纪左手”几个字。（下转第二版）

